

嘗試
論叢

陈平原
主 编

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

——从晚清到“五四”

夏晓虹 王 风等 著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陈平原
主编

嘗試
论丛

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

——从晚清到“五四”

WENXUE YUYAN YU WENZHANG TISHI CONG WANQING DAO WUSI

夏晓虹 王 风等 著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:从晚清到五四 / 夏晓虹等著.
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5. 10
(尝试论丛 / 陈平原主编)
ISBN 7-5336-4539-1

I. 文... II. 夏... III. ①文学语言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 ②文学—文体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
IV. I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0511 号

选题策划:唐元明

责任编辑:唐元明

装帧设计:袁 泉 张鑫坤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 1 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6.5

字 数:400 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 000

定 价:33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822632

邮 编:230063

“尝试论丛”总序

陈平原

自1903年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规定,在“中国文学门”里设立“西国文学史”课程,讲授“历代文章源流”时需仿照日本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而自行编纂教材,百余年来,中国人的“文学史书写”,已然蔚为大观。

作为学科的文学史,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、文化思潮演进、审美趣味嬗变等,有极为密切的关联,同时牵涉到的,还有课程设置、学术眼光以及著述体例等。除此之外,也不该忽略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理路,其中一个关键点,便是所谓的“大文学史”与“纯文学史”之争。这一争论,从“篇幅”迅速滑向“眼光”与“思路”。换句话说,谈论文学史书写策略,“大”的对立面不是“小”,而是“纯”。

最初撰写文学史的学者,不见得都认同章太炎“文学者,以有文字著于竹帛,故谓文;论其法式,谓之文学”的论断(《文学总略》),但对“文学”的理解大都相当宽泛,其著述中往往涉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金石等,把群经、诸子、史书、佛道等全都纳入考察的视野。如此“大而无当”的文学史书写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,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。

从晚清到“五四”,中国人“文学”概念的日渐明晰,是以欧美

“文学概论”的输入为契机的。以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“西方标准”来衡量,绝大部分中国诗文,都显得很不够纯粹,或夹杂教化意味,或追求文以载道,只能称之为“杂文学”。正是在清除“中国文章”中诸多“非文学”成分的过程中,中国学者建构起以诗歌、小说、戏剧为主体,兼及部分散文的“文学”概念,并据此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。像刘经庵那样,断然将“散文”摒弃于文学史之外的(参见《中国纯文学史纲·例言》),不是很普遍;但从“大文学史”逐渐走向“纯文学史”,却是大势所趋。

这里所说的从“大”到“纯”,只是基本走向,并不具体落实为谢无量的《中国大文学史》和刘经庵的《中国纯文学史》。谈及学人的新旧,时人多据此褒贬抑扬,我则倾向于视为知识类型的差异。“新的”不一定好,“旧的”不一定差;文学创作如此,文学研究也不例外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,长期受进化论思想影响,对与自己知识类型不同的先贤评价过于苛刻。就以文学史书写而言,原先略显驳杂的“文学”概念,如今变得清晰可辨,这固然是一大进展;可水太清则无鱼,文学与政治、思想、学术、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割断,又是一大遗憾。这个时候,人们又开始怀念那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的朦胧状态以及其蕴涵着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

大而言之,文学史的书写,“五四”以前的太“大”,“五四”以后的太“纯”。最近二十年,中国学界对文学史的写作有不少反省,其中包括以西方文论诠释中国文学进程所可能产生的弊病(谈小说,勉强说得过去;谈散文,则多削足适履),还有“五四”新文化人建立起来的“纯文学史”写作模式所可能导致的陷阱等。撰写中国文学史,不说“神游冥想,与立说之古人,处于同一境界”,起码也“应具了解之同情,方可下笔”(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)。尊重古人的文学观念,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术语,这点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;只是具体操作中,如何体贴古人的文学趣味,避免隔靴搔痒;如何开拓视野,理解文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;还有,

如何借鉴文化史、教育史、社会史、比较文学、妇女研究的研究成果,所有这些,都有待深入探索。

今日之重谈“大文学史”,主要考虑的是论述视野,而不是著作规模。与时贤普遍推崇专著相反,我更看好专题论文集。这一选择,基于以下考虑:抓住关键,深入开掘,小题大作,千里走单骑,挑战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型文学史。十几年前,我曾专门撰文,分辨研究型、普及型、教科书三类文学史,并批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的垄断地位(参见拙文《独上高楼》,刊《读书》1992年11期)。很可惜,后者的面面俱到、四平八稳、蜻蜓点水、老生常谈,如今已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常态。已经面世的文学史,是否真的有1600种;文学史的刊行,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,这些其实无关紧要。关键在于,现有的文学史书写,大都是因应各种教学需要、项目评审乃至经济利益而产生,故陈陈相因,缺乏独特的个性,更不要说“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了。

不求完美,但求有新意,这一研究思路,决定了本丛书的选题更多地体现作者的眼光与趣味,力图突进所谓的“学术前沿”。至于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,来实践“大文学史”书写的设想,能否成功,实在很难说;也正因此,需要大胆的尝试。

说到“尝试”,很容易联想起新诗开山祖胡适的诗句:“‘尝试成功自古无’,放翁这话未必是。我今为下一转语:自古成功在尝试!”(《尝试篇》)如此豪情,如此志气,欣赏之余,偶尔也想追摹一二。由“尝试”说到《尝试集》,由诗人胡适想到其家乡安徽,当我偶然跟曾出版《胡适全集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朋友说起自己的设想时,双方竟一拍即合。于是,便有了这套不拘一格、众声喧哗、具备多种可能性的文学史研究丛书。

2005年7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目 录

“尝试论丛”总序·····	陈平原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序·····	夏晓虹(1)
--------	--------

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形成说略·····	夏晓虹(5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 ·····	王 风(2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·····	王 风(4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从“自由书”到“随感录” ·····	王 风(7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近代散文对“美文”的想象 ·····	季剑青(92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文学想象与现代散文话语的建立·····	洪峻熹(116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·····	夏晓虹(15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·····	陈平原(18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·····	王 风(23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周作人与清儒笔记·····	葛 飞(26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废名《桥》与《莫须有先生传》语言研究·····	张丽华(30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梁遇春与“新文学中的六朝文”·····	陈 洁(32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与报章小品写作·····	秦燕春(35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

——《大公报》附张《敝帚千金》语言研究…………… 杜新艳(379)

启蒙的两种向度

——晚清京沪白话报之比较(1904—1906)…………… 杨 早(411)

栏目设置与文体风格

——《现代评论》的“时事短评”与“闲话”…………… 颜 浩(435)

小品文的危机与生机

——以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宇宙风》为中心…………… 杜玲玲(452)

选家眼光与史家意识

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编选与出版…………… 杨 志(489)

序

夏晓虹

讨论晚清至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，是一个既老且新的话题。言其“老”，是因为认定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的书面语乃是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成功的标志，或者指出“五四”以后的散文成就突出，这在专业内外，都属于不须论证的常识。而谓之“新”，则是由于将“五四”与晚清勾连，凸显这一时间框架的文学史意义，对于既有的论述仍然构成了一定的挑战。

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，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当事人已在不断建构新文学的历史。1922年，胡适撰写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历数1917年《新青年》提倡文学革命以来“白话文学的成绩”，其中，白话散文的进步已与白话诗的成功以及短篇小说的成就相提并论，显示了新文学在各类文体中的全面获胜（尽管胡适认为“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”）。而这一评价到了鲁迅那里又分出层级，所谓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，虽然用词谨慎，但其更看好散文的意旨仍然一目了然。

受制于杂文“点到即止”的笔法，鲁迅在1933年写作的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，并不曾对此观点展开论说。倒是乃弟周作人此前的诸多论述，很可以移用作其说的注脚。周作人对“五四”以后的散

文小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：

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，实在是“古已有之”，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。（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）

此言自然是针对新文学中的白话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而言，后三者文学典范上显然努力追摹的是西方。而在周氏看来，“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”，故有“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，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”（《陶庵梦忆序》）之说。如此表述并非意味着周氏兄弟贬抑西方的影响，能够在西潮澎湃之际，关注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适可见出其眼光独到与独步一时。

不过，与胡适相同，追溯新文学的本土渊源时，周作人也同样舍近求远。胡适仅成半部的《白话文学史》远从汉代说起，力求证明“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，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”，“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”（《引子》）。然而，除了小说一枝独秀，晚清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，落在胡适眼中，均不能成为新文学直接汲引的源泉。

1932年，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时，虽则截断众流，只链接到“明末的新文学运动”，但其基本的取向仍与胡适一致。周氏著名的说法是，“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，科学，哲学，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，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 and 主张了”（第二讲）。因此，其结论也很明确，“今次的文学运动，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”（第五讲）。至于清代，按照周作人“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”（第二讲）的文学史观，单从一言以蔽之的“清代文学的反动”之讲题，已足见其一无可取。

那么，如何对待与评价晚清蓬勃兴起的白话文浪潮呢？胡、周

二人的见解也如出一辙。胡适批评其有两大缺点：一是区分“他们”与“我们”，把白话作为骨头，抛给下等社会民众吃，“我们”则照样“吃肉”，“做古文古诗”；二是认为：“这些人可以说是‘有意的主张白话’，但不可以说是‘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’。”（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）周作人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里完全接受了胡适的看法，强调晚清的《白话报》与《白话丛书》等“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，那不是白话文学”，因为“那时候的白话，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，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，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”（第五讲）。也即是说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学作者的历史叙述中，已完全否定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。

这一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线索，虽然中经胡适之为“反动文人”、周作人之为“汉奸文人”的政治波折，却未很受干扰，不过从学理上呈现为由影写胡适到发现周作人的转向。而相对于新文学史奠基者们坦承新诗的西方血脉、认可小说的中土源流，被认为在历史传衍上一度中断的现代散文，其来踪去脉也因此更值得学界认真追寻。

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表述为，被胡适与周作人一致省略掉的晚清，在现代散文的形成中真的无所作为吗？从新文学倡导者凸显其与旧传统断裂的决心与张扬“革命”的意义考虑，其跳跃式的历史寻踪有理由被视为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。今日重新检点这一段历史，平心静气地续上缺失的链环，正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标。

简而言之，本书所着意彰显的是，晚清文界革命的发生、新名词的输入、报章文体的出现，以及拼音化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、白话文（包括政论文与学术论文）的书写，对于“五四”文学革命、国语运动、现代文体意识，以及现代散文与论说文走向的意义。由此，从晚清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变迁，作为一个整体，成为本书的考论对象。

为方便论说，本书的撰写采取了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

4 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

式,并给予在现代文章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报刊以特别的关注,内文之分编三辑即由此而来。

此书本为教育部“十五”规划中“晚清文学的兴替与新文学的建立”之课题,采用现在的书名,意在突出从语言变革到文章演化的论述主线。特此说明。

2004年11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形成说略

夏晓虹

一、古汉语面临的挑战

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的变化,与“西学东渐”以及报刊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。

虽然自明朝后期,西学即开始传入中国,但译本数量微少,且限于天文、地理、数学等知识的介绍,在中国学界并未受到很大关注。而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被迫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况,开放通商口岸及设立租界,使得外国势力逐渐深入内地。与此同时,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有了长足进展,西学书籍的翻译日见兴盛。洋务派主办的制造局、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以及由清廷官办的同文馆,成为“戊戌变法”以前西文翻译的集聚地。而出现在书刊中的翻译语汇,便构成了对古汉语的第一个冲击波。

这一时期的译本中,已出现了许多表达“泰西所有、中国所无

者”^①的新术语,在“造新字”^②之外,译者也采用了古语翻新与取义定名的方法。如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译赫胥黎(Thomas Henry Huxley)的《天演论》,便创造了“导言”、“物竞”、“天择”等与新学理相对应的新名词。不过,其时社会与人文科学用语尚不很多,占主导地位的翻译语汇仍属自然科学与技术类。再加上主要用于地名、人名的译音词,西学词汇的外来色彩极为明显。

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,也使近代化的报刊开始在中国出现。自1833年第一份中文杂志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(*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's Monthly Investigation*)问世于广州,到1872年《中西闻见录》在北京出版,西方人士主办的报刊从沿海进入内地,对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。报刊作为开通民智、传播文明的利器,也引起了晚清先进知识者的高度重视。1874年,王韬在香港创办《循环日报》,首开国人借报纸宣传变法思想之先河。到1896年梁启超担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于上海创刊,改良派的办报活动随之进入高潮。

正如晚清论者所指出:“自报章兴,而吾国之文体,为之一变。”^③近代化报刊本以注重新闻、面向大众为特点,其所派生的“报章文体”,便既须以新思想、新事物满足读者的求新欲望,又要以启蒙、通俗的言说方式扩大销路。而表达新思想、新事物必然离不开新学语。因而,报刊流畅锐达的笔调与无远不屈的流布,对西学语汇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借助“百日维新”前夕在全国蔓延的变法思潮,各地地方官一度竞相将《时务报》等维新报刊作为官府、学堂的指定订阅物,使其

① 高凤谦:《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》,《时务报》26册,1897年5月。

② 梁启超:《论学校七:译书(变法通议三之七)》,《时务报》29册,1897年6月。所造新字,如傅兰雅(John Fryer)酌定的各化学元素名称。

③ 《中国各报存佚表》,《清议报》100册,1901年12月。

舆论号召力空前提高。首当其冲的便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旧学。敏感的守旧派学者已充分意识到“贯穴古今，笼罩中外”^①的“报章文体”的潜在威胁，视之为古文的大敌，对其充满恐惧与仇恨。湖南的叶德辉在“戊戌变法”前即惊呼要“辨文体”，痛责：

自梁启超、徐勤、欧榘甲（按：均为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弟子）主持《时务报》、《知新报》，而异学之诃词、西文之俚语，与夫支那、震旦、热力、压力、阻力、爱力、抵力、涨力等字触目鳞比，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，不得谓之词章。^②

所列举的新词语，少量出于佛教，大半源自西学，恰恰反映了此期偏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翻译的趋向。即如《时务报》同人汪康年的《以爱力转国运说》，《湘报》主笔唐才常的《论热力》^③，均是将自然科学用语牵引入政论文，亦为其时特有的现象。

新学语本是新观念的载体。戊戌前，其无孔不入的渗透，使古汉语最精粹的形式——近体诗也不能幸免。1896—1897年“新学之诗”的出现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先进之士对西学的热衷，甚至已达到饥不择食、囫囵吞枣的地步。谭嗣同所作《金陵听说法诗》其三有句：“纲伦桎以喀私德，法会极于巴力门。”据当年的同好者梁启超解释：“喀私德即 Caste 之译音，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。巴力门即 Parliament 之译音，英国议院之名也。”^④这些“经子生涩

① 谭嗣同：《报章文体说》，《时务报》29册，1897年6月。

② 叶德辉：《〈长兴学记〉驳义》，苏舆编《翼教丛编》卷四，武昌重刻本，1898年。

③ 分别刊于《时务报》12册（1896年11月）与《湘报》6—7号（1898年3月12、14日）。

④ 饮冰子（梁启超）：《饮冰室诗话》，《新民丛报》29号，1903年4月。

语、佛典语、欧洲语杂用”^①的试验诗作，虽仅限于朋友圈内流传，却预示着文学语言的变革已势在必行。

二、言文合一的尝试

以文言为书面语的古汉语不仅受到西学译语的冲击，在晚清也遭到了来自中文传统内部的挑战。一向被视为卑俗、地位低下的白话文，此时凭借“开通民智”的口号，声威大振，一时竟形成与文言文分庭抗礼之势。

作为白话文理论先导的黄遵宪，在1887年成书的《日本国志》中，即参照其出使日本时所了解的明治“国语改良”的经验，率先提出语、文合一的主张：“盖语言与文字离，则通文者少；语言与文字合，则通文者多；其势然也。”他要求在增益新字的同时，“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、通行于俗者”，以“令天下之农工商贾、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”^②。随后，梁启超也援引黄说，对“弃今言不屑用，一宗于古”的文言流行造成中国文字难学难通的现实深表忧虑。为使“民智”“国强”，他提出的办法是“言与文合”，则“读书识字之智民，可以日多”^③。二人对言文合一问题的论述，在随后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中也付诸实践。

在白话文从理论转向实行的过程中，裘廷梁的作用不容忽视。1898年8月，裘的名文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》^④在“百日维新”的高潮中发表。该文旗帜鲜明地提倡“崇白话而废文言”，理由是，文言

① 任公(梁启超)：《汗漫录》(后改题《夏威夷游记》)，《清议报》35册，1900年2月。

② 黄遵宪：《日本国志》卷三十三《学术志二》，广州：富文斋，1890年(实际刊成约在1895年)。

③ 梁启超：《〈沈氏音书〉序》，《时务报》4册，1896年9月。

④ 《中国官音白话报》(初名《无锡白话报》)19、20合期，1898年8月。

令“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,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”,因此,“愚天下之具,莫文言若”;而其考证中国古代成周时及泰西、日本“用白话之效”,又得出“智天下之具,莫白话若”的结论。裘文全面阐述了维新派的白话文理论,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纲领。

1900年,澳门《知新报》刊载的《论报章宜改用浅说》^①一文,对此前已在报刊中浮现的通俗化取向更加以明确界说。作者陈荣衮乃康有为弟子,其文不仅论证了接近口语的浅说应作为报章采用的惟一文体,而且对文言之害、俗话之便从应用的角度进行了中肯分析。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:“文言譬如古玩店,浅说譬如卖米店。一国之中,可以人人不买古玩,不可以一人不买米。”报刊的作用既然是“开国民之智,培国民之气”,尤须使用浅白文字,因而,“作报论者,亦惟以浅说为输入文明可矣”。陈氏关于报章文体的意见,为一大批文言报刊指出了向白话过渡的“浅说”一途,富有应用价值。

从其时刚刚传入的进化论观念出发,白话文的倡导者们认定,书面语向口语靠拢、文言文变为白话文,乃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梁启超曾纵观中外,而肯定:

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,即由古语之文学,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。各国文学史之开展,靡不循此轨道。^②

推行白话文,正是顺应时势的明智、进步的选择。

在白话文的实际推展中,白话报刊起了关键作用。1897年11月,《演义白话报》在上海诞生,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白话报纸。到1898年5月,《无锡白话报》创刊,裘廷梁的《论白话为维新

^① 《知新报》111册,1900年1月。

^② 饮冰等:《小说丛话》,《新小说》7号,1903年9月。